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 国家主义^{*}

——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

蔡 拓

【内容提要】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该理论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现实特别是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全球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的博弈提出的。这一博弈表明顽固地恪守全球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理念与价值无助于国际关系的平稳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前行,只有通过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理性定位、协调与融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可以概括为四个向度的理论内涵,即全球主义的观照与驱动、国家主义的基点与目标、历史主义的尺度与过程以及理想主义的关怀与追求。其理论逻辑在于高扬全球主义的起点,注重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互动、磨合和协调的过程,明确国家主义的目标,从而实现新质的起点、务实的过程、现实关怀的目标三者的统一以及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实践价值主要包括四点:一是有助于矫正全球化的失误与偏颇,坚守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大方向;二是有助于促进全球治理原则以及体系的反思与重建;三是有助于破除国家崇拜,遏制非理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狂潮;四是有助于强化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总之,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力图打破政治的二元思维定式,倡导整体政治观、整体价值观与整体政治哲学。

【关键词】 全球主义;国家主义;全球化;政治哲学;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蔡拓,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北京 邮编:100088)。

【中图分类号】 P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0)10-0004-26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09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20年前,笔者提出了“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statism seen through globalism)”的概念与命题,^①认为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凸显了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关系的时代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理性选择就是倡导并践行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如果说当时这一概念与命题提出的主要依据是冷战结束后十年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迁与发展,那么20年后的今天,从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5—2017年的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特别是2008年后的迅猛发展、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纠结与冲突更为频繁、突出和尖锐,已成为各国各民族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顽症”,全面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制约着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迫使人们寻求处理和协调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关系的途径与方法。有鉴于此,重新审视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这一命题,深化该命题的研究,揭示其理论与实践的活力,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概念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涉及全球主义、国家主义、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三个核心概念,其中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基础、前提,而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则是立足于上述两个概念所进行的理论融合与再造,力图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本文的重点是对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进行理论的解读与实践价值的分析,为此首先需要梳理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概念及其要义。

(一) 全球主义的概念与要义

全球主义(globalism)一词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全球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即古典金本位时代(1870—1914年)的产物,但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主义随着全球化被阻断而悄然退场。本文所探讨的全球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全球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指当下学术界、政治界与大众传媒中所认知与言说的全球主义。

迄今为止,对全球主义的界说与认知大体上有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全球主义视为市场全球主义(market globalism)。这一观点认为全球主义是与新自由主义及其对应的全球化模式密切相关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上升到意识形态就是市场全

^①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6—27页。

球主义。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对此表达得最为清晰,他刻意区分了全球化、全球性与全球主义,指出:“我把全球主义描述为世界市场,即世界市场统治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排挤或代替政治行动的思想观点。”^①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主义是一种复数的思想集群,这个思想集群的共同特点是构建区别于国家,并与之竞争的全球性规范价值与行动方略。夏威夷大学的曼弗雷德·斯蒂格(Manfred B. Steger)这样概括全球主义:“将潜在的全球想象(global imaginary)转化为清晰的政治议程、计划和政策的相互竞争的诸意识形态。”^②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主义是事物在全球维度上相互依存的一种形式和状态,具有明显的网络化和流动性特征。这种认知来自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两位学者,他们基于相互依赖探讨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明确指出:“我们将全球主义定义为: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跨国或国际相互联系的、空间广阔的网络。”^③第四种观点将全球主义视为冲破现代性牢笼、立足于全球时代、超越民族国家,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并从全球维度思考、规范社会生活的新理念、新价值和新世界观。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指出,“凡是在人们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承担对世界的责任的地方,凡是在人们信奉‘把地球当作自身的环境或参照点来对待’这么一种价值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谈论全球主义”。^④

第五种观点则带有较多政治色彩,指涉比较宽泛和更大众化的全球主义的认知。如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所理解的全球主义是“一种对国际机制的忠诚高于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对商品、劳动力的流动不加限制,允许人们自由越境;反对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优先获得工作和其他经济利益的原则,反对将其作为公民身份的一个好处”。^⑤中国学者李世默认为,“全球主义根植于被新自由主义者奉为圭臬的华盛顿共识……在其构想中,全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规则与标准,都将必然地迈向一体化。国家边界将逐渐失去意义,甚至消失。文化差异将让位于‘普世价值’。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将主导

① 乌尔里希·贝克著,常和芳译:《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② Manfred B. Steger, *Globalisms: Facing the Populist Challeng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0, preface, p.vi.

③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④ 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泽、冯玲译:《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1页。

⑤ Liam Stack, “Globalism: A Far-Right Conspiracy Theory Buoyed by Trump,”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4, 2016.

整个世界。最终,所有国家都将以几乎相同的模式治理”。^①

以上观点表明,全球主义是一个多向度、多层面、内涵复杂丰富的概念。基于笔者对全球主义的认知,并结合社会发展现实与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本文认为全球主义的要义可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全球主义坚守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全球主义强调地球是一个整体、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是一个整体,在全球性开始彰显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格外重要。其次,全球主义坚守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说和哲学理念。人类中心是相对国家中心而言的。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国家逐渐成为管理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特别是近代民族国家体制确立以来更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破除国家主义和国家中心,倡导人们确立全球意识、全球思维和全球情怀,共同构建全球性的体制与制度,更多地维护和追求人类共同利益。再次,全球主义的整体性与人类中心主义理念要求对国家主义与国家中心进行深刻的反思。全球主义的核心关注与理论灵魂是新的主体——人类、新的视野——地球与整个世界以及新的追求——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此,就需要超越国家主体、国家视野和国家利益。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存在深刻的理念与价值张力,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追求和政治哲学取向。最后,全球主义不仅是一种理念、价值和意识,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和社会主张。全球主义无疑具有理论的品格与深刻性,但也不能忽略其实践意义与取向,否则就难以把握全球主义的全貌。全球主义是在回应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性和相互依赖的新环境中产生的,在当代人类的各种事务中都不难见到全球主义的深刻影响。

鉴于此,本文认为,全球主义是全球化时代因应全球与国家之间日益明显的张力以及全球性的凸显而出现的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它是一种倡导类本质、类主体的政治哲学。

(二) 国家主义的概念与要义

国家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毋庸置疑,关于国家的研究成果也浩瀚如烟,但对于国家主义的界说与认知的文献却与此远不相称。只是在日益深化的全球化不断冲击国家后,作为对全球主义的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家主义概念的界定和阐释才逐渐多起来。笔者曾对国家主义做过界定:“国家主义是针对两个参照系而言的。其一以个人为参照系,指的是在主权国家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轴;其二以全球为参照系,强调的是国际社会主权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要以国

^① 李世默:《全球主义的终结与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https://www.guancha.cn/LiShiMo/2016_12_03_382714_s.shtml, 访问时间:2020年8月24日。

家为中心。”^①今天看来,探究国家主义的这两个视角与维度仍然是最基本的。

以个人为参照系的国家主义集中体现在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中。从政治学角度讲,这种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拥有全面与至高的权力,其权威不可蔑视与侵犯。国家不仅拥有最高权力和自我利益,而且它本身就是目的,个人只有符合国家这一最高目的时才有地位和意义,成为国家成员乃是个人的最高义务,这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让·博丹(Jean Bodin)、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陆续阐述和不断丰富的国家理论。这种国家主义观点在当代的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中都有反映和市场。从政治经济学上看,这种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作用。《罗德里奇国际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中的国家主义词条是:“现有文献中,‘国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没有精确定义。这个概念体现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政府可以直接通过国有企业(SOE)的运营,也可以通过整体经济的管理间接地在经济发展方向上发挥重要作用。”^②

以全球为参照系的国家主义立足于国际问题,关注国家(民族)、全球(国际社会、全球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定位与相互关系。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国家主义势必要回应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正义等问题,从而形成新时代的国家主义。例如基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国家主义。全球化导致跨越国界与地区的联系日益增多。这种联系体现为共同的问题或共同的利益,两者都需要摆脱国家治理的思维与困境,从全球的角度予以回应和协调,进而在制度、机制层面形成超越国家的全球治理。简·阿尔特·斯科尔特(Jan Aart Scholte)指出,国家主义“是指社会治理或多或少等同于领土官僚型国家政府(territorial bureaucratic national governments)的监管运作情况。在国家主义情况下,所有社会规则的制定、实施、监管和执行都是通过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直接或间接发生的。在国家主义的治理下,宏观—区域和全球监管机制(macro-regional and global regulatory mechanisms)规模很小(如果有的话),或多或少都落在各国政府的掌控之下。同样,在国家主义的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国家政策问题上也没有中央政府那样的重大自主权。此外,处于国家主义状态的地方政府缺乏直接与本国以外的更广阔世界接触的实质可能性。简而言之,正如该术语所暗示的那样,国家主义意味着治理在任何意图和目的下都可以

①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6—27页。

② R. J. Barry Jones,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1, p.1475.

简化为国家”。^①

又如基于全球正义的国家主义。公平正义原本是政治哲学特别是伦理道德研究的问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已延伸到国际社会,从而出现全球正义的新议题。在回应与探索全球正义的过程中存在两种理论进路:一是全球主义的进路,主张突破正义理论仅适用于国内社会的局限;二是国家主义的进路。哈佛大学的马蒂亚斯·里斯(Mathias Risse)指出,“国家主义认为正义的所有原则都在国家内部适用,这是因为存在一个统一的理由,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存在于国家内部”。^②由此可见,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保护正义的伦理学说。这种观点坚持正义只是国内事务,只能在一国之内的公民之间实现,它不适用于公民与非公民之间。

综上可知,国家主义的多维度认知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由于参照系不同,国家主义可分为国内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和全球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国内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对个人的优势甚至主宰地位,注重权力的至上性。全球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对全球(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人类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追求和维护国家在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权威。其二,国内/全球意义上的国家主义都信奉国家理性,追求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因而成为目的本身,国家自身的权力与利益日益膨胀,试图摆脱来自国内公民和国际社会的监督,导致国家权力合法性的丧失与变异。其三,国家主义对国家的崇拜很可能忽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在国内导致政治腐败与集权;在国际上则推崇权力与利益争夺,拒斥对话、合作与全球主义,从而加剧冲突,损害人类共同利益。其四,国家主义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在政治哲学的意蕴和本质上是相同的。既然国家主义存在并适用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现实主义也同样适用于国内政治。其五,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有时两者甚至可以相互替代。国家主义是个政治学概念,而民族主义不仅有政治色彩,还有浓厚的文化底蕴,适用范围更广泛。相对于全球主义,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坚守本国/本民族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权威性,追求权力与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审视和探讨当代国家主义时,不能忽视当代民族主义。

二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博弈

对国家崇拜和国家中心的批评与质疑由来已久,其中以世界主义思想最具代

^① Jan Aart 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86.

^② Mathias Risse, *On Global Jus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1.

表性。19 世纪以来,国际组织的发展开始从政治实践上冲击着国家与国家主义。但真正构成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对垒与博弈并产生广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的无疑还是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全球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因此,本文把考察时段限定在 1991—2020 年,其中每十年作为一个阶段。

(一) 全球主义的高歌猛进(1991—2000 年)

每个世纪都会有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在人类历史上,能被称作 20 世纪重大事件的有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政权的覆灭、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苏联解体与两极格局的终结。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会对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在上述事件中,第三次科技革命、两极格局的终结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直接影响了 20 世纪最后十年的发展向度与特征。以计算机、通信技术发展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开辟了全球化的新时代。人类的社会生活具备了新的生产力基础,必然由此发生重大转型。两极格局的解体则从国际制度与体制上解除了两大阵营、两种社会制度间的分割、封锁与对立,提供了相互对话、交流乃至合作的可能与契机,为人类在一个整体性框架下进行更密切的交往创造了政治条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真正融入国际体系,一个日益整合起来的国际社会开始呈现于世界,与冷战时期两极对抗的分裂性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不难看出,20 世纪 90 年代是全球主义高歌猛进的时期,其具体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世界市场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汹涌。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陆续转向市场经济,大力开展国际贸易,终结了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两种经济制度和两个市场的局面,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与世界经济。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极大地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无疑渗透着全球主义的理念与精神。为了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大发展,被称作“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于 1995 年正式成立,从组织和机制上强化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

其二,联合国的地位明显提升,以联合国为平台、全球问题为聚焦点的全球性会议积极倡导全球主义理念、原则、政策与行动。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 年)、第二次世界人权会议(1993 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1994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 年)、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议(1995 年)和《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1997年,又称“京都会议”)等会议陆续召开。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表达了摒弃冷战与对抗、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同应对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愿望,倡导树立“只有一个地球”的理念,努力构建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致力于达成既尊重所有各方面的利益,又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国际协定,认识到我们的家乡——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①

其三,主要大国均反思并调整治国方针和对外战略,营造了对话、合作、求同存异和相对平稳的政治环境,增强了建设整体性国际社会的信心。彼时,美、英、德、法等国领导人一致表示认同“第三条道路”,明确把“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作为政治目标,从治理角度去审视国内外事务。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恰恰反映了当时政治哲学与政治理念由国家中心向社会中心的转变,这意味着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与作用的提升,意味着国家之下的社团、地方力量与国家之上的国际组织与全球公民社会力量正在成为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新角色,而这些去国家、超国家的行为体所信奉的正是重视个人与人类的全球主义理念。值得一提的是,中俄两国为营造相对平稳的国际环境与秩序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一轮高潮。确立改革的市场经济导向、积极参与和应对全球化以及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举措彰显了中国从世界看中国、融入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愿望与理念。俄罗斯迈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解、发展市场经济以及国内改革与转型的步伐。

其四,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进入鼎盛时期。伴随对国家的反思和社会中心的倡导,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理念的认同与传播形成一个新高潮。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并能引领实践。20世纪最后十年,全球主义之所以能够高歌猛进,就是因为全球化、全球治理、相互依赖和全球性等理论集中涌现,引领了人们的思维与视野。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的全球时代与全球性观念、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世界主义民主观、贝克的风险社会与全球化见解、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立足于文化视角对全球化的解读、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的两枝理论和“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洞见以及基欧汉与奈基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诠释,都为人们认知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全球主义注入了活力。成立于1992年的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①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载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Global Governance)更是于1995年推出《我们的全球之家》报告,在全球广为流传。^①《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推出“治理”专题,集中刊登了多位学者研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成果。^②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结合自身工作的性质与特点,从发展角度倡导全球治理。这不同程度地显露出世界主义的情怀与全球主义的理念和价值。

与全球主义的高歌猛进相比,国家主义在这一时段处于守势,但并非无所作为,其与全球主义博弈仍然存在。从国际关系的现实角度看,北约东扩、围绕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干涉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外的反全球化骚乱三个代表性事件体现了国家主义的立场与诉求。北约东扩进程的展开导致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发生了冲突,国家主义成为俄罗斯回击北约东扩的武器。人道主义干涉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其成为一种处理国际事务的常态手段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争论,是20世纪90年代之事。在科索沃战争之前,已有索马里、卢旺达等人道主义干涉案例,其政治焦点是国际社会是否有权干预一国之内出现的严重侵犯人权以及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问题。维护人权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人类的共同要求。因此,当一国政府不能应对或本身就是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罪魁祸首时,国际社会的干预就具有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需要得到联合国或地区共同体组织的授权,不能由大国自行宣布和实施。科索沃问题就是未经联合国授权而由大国擅自进行的干预,自然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凸显了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较量。1999年的世界贸易西雅图会议原本旨在解决世界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却遭到会场外反全球化人士的反对,并从和平示威走向骚乱。西雅图的反全球化运动一方面告诫国际社会要警惕并阻止全球化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渗透了国家的利益与诉求,也间接地折射出对全球主义理念与价值的排斥。

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质疑全球化的声音与著作也大量存在,其代表性观点包括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在现象上远不是全球化而是国际化,在本质上远不是全球经济而是国际经济,正如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与格雷厄姆·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所说:“世界经济远不是真正的‘全球’经济。相反,贸易、投资和金融流动集中在欧洲、日本和北美三大集团(the Triad),并且这一优势地位看来还要

①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参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第9—113页。

继续保持下去。”^①第二种观点认为无论是日益增多的经济区域化还是跨国公司的活跃,世界经济行为始终未能摆脱国家的调控,去国家化和“国家过时论”等观点是荒谬的。如英国学者阿兰·鲁格曼(Alan Rugman)认为全球化的真实含义是“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②而“跨国公司是国际商务的引擎,但是它的思维区域化,行动本土化”。^③第三种观点认为当前的全球化不仅在程度上和范围上被夸大,而且在作用上被神化和理想化。事实上,今天的全球化还未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而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推崇和人类超越民族国家走向全球文明的欢呼则被现实证明是一种虚幻和一厢情愿,所以鲁格曼的结论是:“我相信我们正在目睹全球化的终结。”^④

综上,在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博弈的第一个十年,凭借全球化的新浪潮和两极格局瓦解后的世界新秩序,全球主义受到更多青睐,而国家主义处于守势。但两者的本质及各自的优势与偏颇都得到体现,并在博弈中持续性调整和修正。

(二)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僵持(2001—2010年)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主义兴盛的黄金时期,21世纪头十年则是全球主义受到重创、国家主义恢复元气并试图回到世界舞台中央的时期:一方面,全球主义上一阶段的余威尚存;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回归的势头兴起,两者处在势均力敌、相对平衡的僵持状态。

如前所述,对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挑战在1999年的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中已经显现,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更直接更猛烈地冲击了全球化与全球主义。

“9·11”事件曾被一些人认为是国际关系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给美国带来了灾难,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全球反恐战争以及美国的新安全战略将全人类捆上了反恐战车,使美苏在冷战后试图建立的基于信任与对话合作的国际关系进程严重受挫,地缘政治、暴力与帝国主义话语再次回归。“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实质就是基于单边的、先发制人的狭隘安全观,滥用霸权地位追求美国自身安全。国际关系再度被“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理念支配,导致国家间的紧张、猜

① 保罗·赫斯特、格鲁厄姆·汤普森著,张文成、许宝友、贺和风译:《质疑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 阿兰·鲁格曼著,常志霄、沈群红、熊义志译:《全球化的终结》,北京:新华·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

③ 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第1页。

④ 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第1页。

疑与对抗。在这种大背景下,全球化消亡的观点日益增多,^①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质疑派认为“全球化遭遇了艰难的时代。如果它曾经是社会现实的有用描述的话,那么它现在已不是,也不能提供对形成我们世界的社会力量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此外,因为人类适应了单极世界的现实和文化与宗教的冲突,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事业,全球化已经被新帝国主义所取代。因此,世界正见证着全球化作为社会本体论、解释前提和社会愿景的消亡”。^②“9·11”事件及其后反恐战争的现实意味着“加强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回归、美国军事霸权、强势国家和边界关闭的世界”。^③国家主义开始占据上风。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博弈中起到了双重作用。国际社会在危机的早期应对中表现出空前一致,即反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共克时艰,避免重复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错误。基于这种共识,二十国集团(G20)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峰会,并被赋予协调、统筹世界经济的重要使命。主要大国纷纷投入巨额资金,共同克服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营造国际金融贸易平稳发展的环境。这些做法取得了显著效果,也表明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理念仍有一定市场。然而从几年后的现实来看,世界经济从谷底的爬升总体上比较缓慢,远不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欧盟和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巴西、南非三国都处于经济衰退及其引起的社会动荡之中。这种状况迫使人们将目光转回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家主义思维与理念明显回潮,并与“9·11”事件激发的国家主义汇合,影响力更广、更大。

21世纪的头十年,除了上述两个标志性事件集中反映了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博弈的走向外,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和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也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俄格冲突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强势回应,也是对独联体国家倒向北约、倒向西方的警告,这是典型的地缘政治。既然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发起伊拉克战争,那么其他国家这么做就无可非议,因为这就是国家主义在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上所遵循的必然逻辑。因此俄格冲突不仅是国家主义回归的产物,也进一步强化着国家主义。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展现了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

① 参见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著,陈志刚译:《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戴维·赫尔德著,周军华译:《全球盟约: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王生才译:《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② 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引言,第4页。

③ 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引言,第1页。

族的自豪感。奥运会本身具有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底蕴,所以北京奥运会也充分体现了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人类与同一个友爱、和平、发展的目标等理念,与当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一脉相承。但与此同时,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也撞击了国家主义者的心弦:在一些国家眼中,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着国际格局,塑造着新的国际体系与秩序。这种冲击很容易导致国家主义者的反应,其试图提升本国的实力与影响力来对冲中国的快速发展。而中国国内社会也面临着非理性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潮带来的新考验。

在21世纪的头十年,尽管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博弈开始向国家主义倾斜,但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研究的理性声音依旧比较强大。这种理性声音指出,纵然“9·11”事件后经济全球化速度放慢,从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从稳定转向不稳定、从软实力转向硬实力,但“与其说是全球化的消亡,从其多种形式来看,经验证据相反表明,全球化比其批评者认为的或者许多人所期望的更具活力和社会内化”。^① 这种说法的依据在于支持全球化本质与步伐的深层驱动力依旧活跃。这些驱动力就是“与信息革命相联系的全球通讯基础设施变化;与国际范围内信息传播相关联的全球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发展,多国公司推动的新的劳动分工,冷战的结束和世界各地民主与消费观念的传播;与经济需求模式,人口统计和环境恶化相关的移民与人类流动的增长。这些深度结构化的进程产生了全球相互联通密集的、真实的和虚拟的模式。结果是政治共同体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离散的世界’,它们被陷入相互重叠力量的复杂结构当中”。^② 基于这种认识,这些学者呼吁“社会科学的全球转变”,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分析范式的转变,以便全球性出现的条件,即世界作为一个社会共享空间意识的增强,能够在各个方面被解释和理解”,^③以实现从“方法论民族主义”“方法论国家主义”向“方法论全球主义”的转变。这种理性的认识与声音在很大程度上节制与平衡着国家主义的狂热与崛起。

(三) 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2011—2020年)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谓乱象丛生,“黑天鹅”事件迭出。比如西亚北非政治变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伊斯兰国”崛起、叙利亚战争、乌克兰危机、中美贸易摩擦以及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透过这些乱象与事件,依然可以捕捉住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博弈。

一是地缘政治与共存政治的较量。乌克兰危机与克里米亚事件体现了北约东扩

① 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第5页。

② 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第6页。

③ 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第6—7页。

进程中俄罗斯基于国家安全与北约和力求融入西方的乌克兰政府的较量,是传统和典型的国家间地缘政治冲突。叙利亚战争与打击“伊斯兰国”则兼有反恐战争和地缘政治的特征,体现了国际社会不同政治集团的较量。在这些博弈中,国际社会基于全球主义考量,依托联合国展开对话来控制 and 解决武力冲突、政治危机的方案以及构建和平、共存的国际环境的努力均告失败,国家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是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较量。全球化倡导并推进经济一体化,集中体现为主张经济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因此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鼓励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努力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但是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不稳定、不安全状态,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声音日益增强,相应政策不断出台。这在欧洲债务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中得到明显体现。

三是围绕移民与难民问题的较量。支持人类的国际流动包括对战争难民、经济难民的接纳与安排,这是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理念与政策选择。但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和失业率增长、局部地区冲突引起强烈社会动荡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关闭国门与拒斥难民的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民粹主义甚嚣尘上,集中体现在欧洲难民危机与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中。

四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的博弈。在第三个十年里,对全球化的态度、立场与政策分野更加鲜明与突出。尽管前两个十年中,批评和反对全球化的力量与声音始终存在,但远未达到泾渭分明、严重对峙的局面。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民粹主义理念、价值、社团和政党在欧洲与美国掀起狂潮,这不仅改变着本国的政治生态,而且重塑着国际秩序。英国脱欧直接关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其后续影响远未结束。特朗普对全球化的讨伐、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抨击、对美国利益优先的强调以及对国际贸易和 WTO 原则的更改,无不鲜明地宣示其国家主义立场。而这种赤裸裸的国家主义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其他国家也予以国家主义式的回应,世界似乎退回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五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启示。它从人的生命安全和人类的生存安全角度展现了个人、国家与人类整体的关系问题,要求人们从生存哲学的高度去审视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政治、军事、经济安全通常是传统上各国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而随着全球问题的增多,环境、气候、毒品与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日益受到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即是一个生动案例。客观地讲,关涉人类命运与生命安全的疫情历史上早已出现过,但在科技高度发达的 21 世纪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全球却是人类万万不曾想到的。然而,这一残酷的现实不仅存在并仍在持续。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每个人、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不仅深刻感受到世界的相互依存和整体性,期待着相互间的支持与帮助,关心着全球疫情动态,同时又基于自我安全的考量不得不在一定时段与一定领域关闭国门,感受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中断带来的生产停滞、物资匮乏等困难。全球主义的理念与情怀由此同国家主义的理念与情怀奇特地并存、交错,既带来希望也造成痛苦。这种来自生存哲学的“天问”,为近30年来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碰撞与博弈增添了意味深长的色彩,要求人类反省和回答。

显而易见,近十年来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今后国际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必定会遵循国家主义的理念、沿着国家主义的轨道前进吗?或者在战略与政策选择上,人类应该选择国家主义的战略与政策吗?答案肯定是多元的,因为不同理念、价值的认同决定着不同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本文认为,近30年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博弈的历史证明,片面、顽固地恪守任何一种理念与价值都无助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以及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应当通过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理性定位、协调和融合,发挥两者的优势,克服不足。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正是基于此提出的。下文将对其进行理论解读和实践价值分析。

三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解读

笔者曾指出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要义是“既区别于理想的全球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的国家主义”,并从认清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大趋势、自觉认同主权的相对性、按照民主化的原则改造国际组织强化国际机制、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支点以及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五个方面予以分析。^①以今天的眼光去审视,上述分析显然过于简略,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一) 全球主义的观照与驱动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是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理念、两类政治哲学的组合与协调,必然反映两者的理论精髓、体现两者在这种新组合中的位置与作用。基于此,本文首先要强调全球主义在该理论中的观照和驱动作用。

“观照”不同于“关照”,从佛教用语来看具有以智慧照见事理,审视的思考、比较之意,实际上体现着一种对世界万物的大爱和自我认知。在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

^①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6—27页。

义这个命题与理论中,全球主义的观照作用源于其本身的全球视野与情怀,即要始终以全球的维度和高度审视人类的公共事务和发展进程,以人类的共同利益和追求去塑造各个民族、国家与共同体的关系,以尊重每个人的平等道德地位与权利去构建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制度、机制和规范,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类的整体性和谐与进步,为每个人获得真实的幸福感和基于个性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全球主义的观照作用就体现为其追求的理念、价值和规范意蕴深、站位高,有历史的宏大视野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反映出人之为人的文化本质与境界。人是文化的人,具有超越性追求。全球主义的观照作用就在于能够以人的本质所要求的超越性、人文性和伦理性去护持人类文明的进程,使其不迷失方向和犯下颠覆性错误。

“驱动”意味着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引领。全球主义的驱动与引领作用则在于审视与管理人类公共事务首先要立于全球主义的制高点,在全球主义的理念、价值和规范的引领下制定相应的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换言之,全球主义是动力源,由此发力会使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更理性与顺畅、人类文明的进程更扎实与健康。全球主义的驱动引领作用与其观照作用一样源于全球主义自身的学理深度与伦理境界,吸引并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

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主义的观照与驱动意味着要始终站在全球主义的制高点上,清楚地把握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认识到相互依存已成为人类的内在生活方式。无论全球化进程还会出现多少挫折反复,历史的车轮都将沿着更紧密的相互依存、更鲜明的人类整体性的方向前行,这种客观性不会逆转。全球主义的观照与驱动作用也决定了全球主义在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理论中的轴心地位,偏离或矮化了全球主义的观照与驱动,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理论就只能走向片面的国家主义,失去其独特的理论内质与作用。

(二) 国家主义的基点与目标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国家主义的核心都是强调并坚守国家在人类公共事务中的优先性、首要性和权威性,体现为国家利益优先、国家权力至上、国家制度的神圣与国家安全的不可侵犯等。个人权利则要服从于国家,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安全以及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取决于国家基于本国利益与安全的考量。国家主义的这些理念与原则归根结底就是强调国家主体与国家中心,个体与人类则要以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为准则、宗旨与目的。这种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往往会失去理性约束,沦为片面的、非理性的国家主义甚至走向更极端的国家专制主义。实际上,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也可以有理性的思考与定位,从而形成理性的国家主义。理性国家主义的要义有

三点:其一,以国家主体为主导,但不排斥非国家主体的地位与作用。其二,国家利益优先但并不唯一,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并非不可动摇的目标。其三,在坚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前提下,承认国家权力向下、向上和横向的扩散,愿意与这些新的权力与权威对话、协商与合作。这种理性国家主义就是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政治哲学所认同的国家主义。

基于对理性国家主义的认同,可以说在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政治哲学中,国家主义是审视和处理当代人类公共事务的基点与目标,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迄今为止国家依旧是人类公共事务最基本、最主要的承担者,在国内层面仍然是社会资源与价值的主要分配者、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主要管理者以及社会秩序的主要保障者,因而是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另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国家依旧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尽管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所以,在审视和处理全球化背景下的诸多问题与事务时,我们不仅需要全球视野与情怀的指引,同样需要对国家所面临问题的清醒认识、对国家意愿和利益的理性评估以及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客观定位。如果脱离了国家这个主体、主角,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规划都将失去现实依托,沦为空谈。国家主义是审视和处理人类公共事务的基点与目标,也是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政治哲学的另一根支柱。

必须再次强调,这里所说的国家主义是理性的国家主义。非理性的国家主义只能走向片面和极端,夸大国家的绝对主体地位与绝对主宰作用,也就不会承认全球主义的观照和驱动作用,拒绝个体、类主体在全球化时代参与人类公共事务管理的必然性和合法权利,从而使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而理性的国家主义则告诫人们不可偏离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与基础,即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会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主体与行为能力最强的国内外事务的主角。同时,理性的国家主义也懂得国家主义的基点与目标会根据不同阶段的现实有不同呈现,而全球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则规约着整个全球化时代,是更高层次的伦理归宿。

(三) 历史主义的尺度与过程

作为两种理念、价值与政治哲学,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两者思考问题的角度与对象不同,价值偏好与倾向也不同。但当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被纳入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这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后,两者就不再是简单和直接的理念和价值的对立关系,而有了中庸的色彩和历史主义的意蕴。换言之,不能用抽象和绝对的思维与话语解读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而要用历史主义的视野与尺度去分析阐释

两者存在的条件、互动的过程以及变动中的新形态与新关系。

本文所说的历史主义是广义上的历史主义。它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著作中的历史意识,后经基督教神学历史观以及18世纪初期意大利历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提出“历史是人类社会及其生存制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观点,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在欧洲真正兴起,浪漫主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德国历史法学派、进化论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从不同角度与层次反映出历史主义的影响。^①这种历史主义的要义有三点:一是重视自然与社会现象、事物发展的条件与环境,认为任何自然与社会现象、事物的生成与发展都需要特定的条件与环境。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条件论和环境论。二是重视自然与社会现象、事物发展的过程,认为任何自然与社会现象以及事物的生成或消失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就是历史主义的过程论。三是重视自然与社会现象以及事物的发展性、变动性,认为世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普遍主义的理念与思维容易走向抽象、静止,难以解释变动不居的自然与社会。这就是历史主义的发展论。显然,历史主义的上述理念与原则具有很多合理性与启示价值,但也必须警惕其可能滑向抹杀事物本质规定性的相对主义。

历史主义的尺度与过程体现在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中。历史主义的尺度就是其倡导的审视和处理人类社会生活的条件论、过程论与发展论三原则。我们之所以认同全球主义并主张全球主义对国家主义的观照与驱动,是因为人类文明已进入全球相互依存的新时代,必须认清新的时代条件、顺应新的历史趋势。全球主义的理念与价值是这个时代的标示性理念与价值,反映并代表着全球化时代的新质,以时代的新质去规范和指引人类的思考与行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义这些新事物、新现象在当前仅处于自身生成的初始阶段,还需要较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主义一方面不断呈现与成长,另一方面也遭遇来自国家主义的抵制与反抗,所以过程论的原则与思维就是告诫人们要研究、重视、应对这个过程。首先,全球主义所标示的全球化时代尚处于该时代发展的起点,远未成为主流、主导,它对国家主义的观照与指引作用只能在体现时代的新质、占据了理念与价值制高点的意义上去理解与定位。这里要关注的正是起点论与过程论的协调。其次,过程的呈现是多样的、丰富的,由于各个民族、国家与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传统、制度弹性和民众心理等不尽相同,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博弈也必然千姿百态。

^① 关于历史主义的演变历史,参见马德普:《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载《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65—74页。

在平衡与协调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关系时,要注意这种多样性并采取不同的形式与路径。最后,过程论视角与思维实际上体现并要求更多的包容性。在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中,重视过程就是肯定较长历史时期内国家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存在合理性。应更包容、更实事求是地回应国家主义疑虑与要求,做好两者的平等对话与沟通,在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发挥两者的合力。

(四)理想主义的关怀与追求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无疑具有理想主义的特质,这种追求相对于现实社会而言可能有些超前、相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可能标准偏高,往往难以实现。但理想主义不能被片面地理解为空想、臆造与不切实际。必须区别理想主义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与实现理想主义追求的途径、道路与方法。理想主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和平等,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实现人性之善,这些理应予以肯定。但由于其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知与把握,在实践环节往往难以操作与实施。所以,对于理想主义也要有理性的认知。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之所以需要理想主义并体现出理想主义,是因为全球主义所倡导的全球思维、理念、价值与情怀是超越国家主义的。国家在现实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无论是主体、空间、制度还是价值都有鲜明的国家性特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倡导和推进全球主义,当然具有理想性和超越性,但并非完全脱离现实,而是把握了时代发展的新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代表着人类文明前行的趋势,也是人类特有的不断超越现实追求更美好未来的文化性的体现。如果无视全球相互依存对全球主体、全球空间、全球制度与全球价值日益强烈的需求,就无法摆脱诸多超越国家的全球性问题带来的困惑与困境,难以推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健康运行,从而最终阻碍人类文明进程。可以说,理想主义为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注入了精神之魂、人文之魂。

(五)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要素、特征与逻辑

基于上述四个向度对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内涵的分析,本文从总体上对该理论进行如下概括。

其一,理论要素。任何一种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核心理念与要素,但又往往吸收借鉴其他理论与政治哲学的合理成分与要素,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也不例外。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是该理论的核心理念与要素,此外也吸收借鉴了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要素。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思维与情怀显然与全球主义能够产生共鸣,其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与全球主义

注重个体与类主体以及强调个体道德权利和地位在全球的普遍性合拍。理想主义的理想性、超越性与全球主义倡导的全球性密切相关。理性主义则为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诸多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提供了理论支撑,集中体现为理性、进步、普遍主义等理念的传播与影响。历史主义倡导的条件论、过程论和发展论的确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和思维方式,这种独特性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与地位颇具启示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借鉴和吸收了历史主义的合理元素,又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即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方式上认知历史及其过程,从而建立了更为辩证、系统和全面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一起成为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要素。总之,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一个吸纳了多种理论要素的理论群。

其二,理论特征。既然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可视为一个理论群,势必产生多种理论协调和定位的问题。从理论特征上不难发现,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具有中庸、综合和改良的色彩。中庸既是指一种道德标准,又是指一种哲学思维和思想。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主张为人处事要不偏不倚、执中而行,追求中和之道。理论上的中庸意味着能够有意识地兼顾各种理论要素的平衡,保留发扬各个理论要素的精髓与要义。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就体现了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个核心理论要素的平衡,避免过于理想的全球主义和过于极端的国家主义。综合是指对多事物、多要素的整合。在这种整合中,各个事物、要素的地位与作用并非平列的,它们的权重和角色要服从于全局的、整体的架构与本质的需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包含了全球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多种理论,而该理论的整合则要以全球主义、国家主义为轴心和主线,其余的理论则只能起辅助作用,从不同的角度补充完善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增强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实现了这一目的,就达到了理论综合的要求。改良的基本含义是在不触动事物根基的前提下加以改进或进行灵活的调整。改进主要是针对现有的缺点与不足,而灵活调整则可能意味着对事物本质和基础做局部的、有限的修正,使之更适合现实需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改良特征体现为适当降低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理念及价值相互对立的声调,赋予两者更理性的意涵与色彩。这一点通过历史主义的条件、过程、发展以及语言表述等各个环节的运用予以实现。

其三,理论逻辑。理论的逻辑是否鲜明、清晰与有力直接决定其说服力和吸引力。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逻辑简单地讲就是起点—过程—目标。起点是指

全球主义的起点。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要鲜明地凸显出全球主义理论与价值的制高点。如果该理论未能首先在理论上凸显并阐释清楚全球主义的历史地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选择它的必然性,那么该理论就失去了灵魂。倡导和坚守全球主义无疑是这个理论的特色与根本支柱。过程是指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互动、协调与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借助又体现的理论工具是理性主义(理性分析)、历史主义(条件论、过程论和发展论)与改良主义(灵活性与平和性)。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关系(包括理论建构与实践活动)要在过程中展现。而为了避免在理论本质上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立所导致的紧张关系,就需要利用上述理论工具在过程中缓和两者的对立,寻求相互克制的平衡点。目标是指国家主义的目标。国家和国家主义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特殊重要地位,决定了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必然以国家主义为现实目标。不过,这里的国家主义已经是改良后的国家主义、理性化的国家主义、有限的国家主义和能够接受全球主义理念与价值指引的国家主义,实现这个目标正是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务实追求。由此不难发现,以国家主义为现实目标虽然指明了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落脚点,但这个目标和落脚点要受到全球主义的规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以国家主义为现实的目标既是国家在不同阶段追求的目的,又是实现更理想的全球主义理念与价值的手段。

四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实践价值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不能停留于空谈与思辨,而应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下文对该理论的实践价值进行分析。

(一) 矫正全球化的偏颇与失误,坚守全球化的大方向

从更宏观的历史跨度上讲,全球化已经历了四个时期,即15世纪之前的全球化渊源与萌芽期、15世纪至19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成长期、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成型与反复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提升与变革期。^① 尽管这一轮全球化的分期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但其鼎盛时期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冷战结束,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进入下行期。本文所研究的冷战后30年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博弈恰恰是全球化从上行鼎盛走向下行的反思与变革时期。此轮全球化为什么会从鼎盛走向退潮,从社会主流的拥护、赞美转向更多的批评与反对,从中应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如何认知与应对当下的全球化。这显然是全球主

^① 蔡拓等:《全球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9页。

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必须回答的问题。

概括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的失误、偏颇与弊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全球化被片面地夸大,去国家化走向极端。此轮全球化凸显了全球相互依存,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家在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时的能力缺失与不足充分暴露,导致其地位、作用与功能受到质疑与冲击。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中心论和去国家化的呼声与认知与日俱增,甚至出现“国家过时”“国家消亡”和以社会组织与管理取代国家政府的极端主张。这种认知偏颇导致全球化的实践产生了严重后果。其二,强势的金融全球化塑造了扭曲的全球经济与政治生态链,赋予了资本更多的流动性与权力,这导致了四个后果:一是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确立的国家有效管控金融的共识与制度,造成国际金融的失控与危机;二是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所带来的权力不仅削弱和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而且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更大裂痕;三是确立了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优势,加剧了两者的矛盾;四是助长了虚拟经济,制约甚至压制了实体经济。这些后果干扰了全球经济的正常发展,破坏了全球经济政治生态,并酝酿着深刻的全球经济与政治危机。其三,全球化的弊端引起国际社会和广大民众的不满、愤慨与反抗。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全球贫富差距的加大,这种贫富差距在国内表现为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在国际上则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社会福利、健康状况和人均寿命等基本生存状况的差距。这种差距较20世纪80年代前呈明显扩大之势。此外,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还引发或加重了各国、各民族与各个社会阶层和集团间的新矛盾,成为人类社会动荡的又一原因。全球环境恶化和气候升温也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以及跨国公司追求利润而造成的环境污染有关。其四,全球化未能摆脱权力争夺的阴影。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现象与进程,但这个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与军事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充满了国家、地区和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大国竞争的加剧无疑恶化了国际环境,冲击了现有的国际秩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失误、偏颇与弊端绝不意味着全球化客观性的终结与合法性的丧失。立足于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可以发现全球化的客观性与合法性根源于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所带来的全球相互依存。凭借通信网络技术和交通工具的革命性变革,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为纽带,辅之以相应的组织、规范、制度与机制的全球社会正日益发展,这个大的历史走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每个时期的全球化都会经历启动、上行、高潮、下行的阶段,但全球化总的历史进程是不断提升与深入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以来

的全球化发展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一轮全球化的下行与危机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空前困境都不能使我们得出全球化终结的结论。只有认同和坚守全球化的大方向,在此前提下认真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误、偏颇和弊端,并下大力气采取果断措施予以纠正克服,才能摆脱当下全球化的艰难困境,开辟全球化发展的新前景。

(二) 促进全球治理原则与体系的反思与重建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伴生物,也是30年来人类管理公共事务、协调国际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体现为治理的主体、对象、方式与价值追求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治理,也不简单等同于国际治理。治理的主体从国家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治理的对象从国家或国家间事务扩展到关涉人类整体的全球性问题;治理的方式从国家熟悉的统治和市场规则转向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调的治理;治理的价值追求从单一明确的国家利益转向兼顾人类共同利益与整体利益。这些变革也同全球主义的观照与指引作用相吻合。30年来,全球治理在治理人类面临的诸多紧迫的全球问题方面通过协调对话与建章立制取得了历史性成绩,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防范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恐怖主义、推进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防治非传统安全、制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等方面。但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地缘政治和国家主义回归,全球治理出现空前的困境,突出体现在治理本身受到质疑、治理机制遭到冲击、治理效率低下和治理领导权之争加剧四个方面。

面对这种困境,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做出的反思与回应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高举全球治理的旗帜,进一步明确并坚守全球治理的理论本质与要义。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相伴而生,全球化的历史客观性与走向决定了全球治理的历史客观性与走向。尽管当下全球治理处于低谷期,但伴随全球化反思后的新进程,全球治理也会在不断反思与变革中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对全球治理的坚守需要国际社会有更多的理论共识,即明确与认同全球治理的两个理论支撑:一是行为体的多元化,只有国家的治理和传统的国际治理不能称为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主体中必须给予非国家行为体应有的承认与尊重。二是全球主义的价值,多元行为体参与的全球治理当然要维护国家合理正当的权益,但其更本质的追求是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意愿与整体权利。偏离全球主义价值的治理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

其二,全球治理的共治特点要求在理念、组织构建与机制运行等方面平衡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承认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更基础的地位。在理念上要同时破除国家中心和社会中心,坚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并重。在组织构建和机制运行方面,要充分考虑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现状以及不同地区和国家集团间的平衡,并及

时进行动态调整。比如中国的发展成就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应适当增加中国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在国际组织与机制方面的话语权。“9·11”事件、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显示了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认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主导作用是反思和重建全球治理体系与原则的重要环节。

其三,根据国际关系的新现实,调整、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与机制,提高其权威与效率。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表现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倾向。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改革已提上日程。但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缺乏理性认识,所以体系变革的程度与速度远不尽人意。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一方面带来了机制的重叠,另一方面体现出不同地区与国家集团在具体治理议题上的博弈,这些可通过整合已有机制以及重新审视和商讨机制的制度安排与规则来达成新的共识加以解决。

其四,全球治理的领导权之争是一种客观存在。全球治理领导权体现在对全球治理议程选择、规则与机制制定以及结果控制等方面有明显的影响力和作用。这种领导权来源于或依托于硬实力(主要是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与软实力(良好的国内治理、公认的制度和价值的吸引力、号召力)。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的现实而言,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更多领导权,美苏一度扮演着世界领导者角色。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毋庸置疑的领导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者地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已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中举足轻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彰显。这种走势在特朗普宣扬“美国优先”并不断“退群”后更为明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美国应对疫情的消极表现及围绕反种族主义抗议的社会分裂更是严重损害了其世界领导者形象。

(三) 破除国家崇拜,遏制非理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狂潮

全球化与国家化、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相伴而生,冷战后的30年我们目睹了两者此消彼长的过程。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某些失误与偏颇导致20世纪90年代被抑制的国家主义反弹和回归。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国家崇拜强势崛起,非理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几乎所向披靡。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基于生命安全的考量,更在客观上提供了闭关锁国的理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暂时性中断也为国家崇拜、非理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助力。高度警惕并有力驳斥这种理论思潮、政治诉求和文化情感十分急迫和必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

义明确指出,审视和处理人类的公共事务与相互关系,国家主义既是基点又是目标。在这一特定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其合理性,即便是民粹主义对公平等价值的追求也无可厚非。然而当它们越过红线,走向极端的国家崇拜和民族主义狂热,就会丧失理性。当前全球的国家崇拜和民族主义狂潮背离了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趋势,阻断了各国家、民族间的正常、密切与互利的相互往来和全方位的联系,助长了强人政治和专制统治,必须予以批判和抵制。目前可以采取三点做法来遏制这一趋势:一是开展深入持久的全球主义教育。可以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梳理并研判全球化的利弊得失,明确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博弈的症结,从而增强对全球主义的理性认同和对国家主义的合理定位。二是总结百年来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的恶果,认清国家崇拜、非理性民族主义与专制统治的关联与危害,抵制非理性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三是着力于整个人类特别是广大民众思想素质的提高,增强克服“平庸之恶”的自觉性,造就爱思想、爱自由,有独立精神、社会责任和世界情怀的新人。

(四) 强化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将国家定位于人类公共事务的基点与现实目标,凸显了国家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当下人类面临的诸多困难挑战大都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相关。因此,强化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是化解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困境,赢得抗击疫情胜利,恢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推进21世纪人类文明进程的重中之重。

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首先要解决国家治理领域和功能的全覆盖。治理领域和功能的全覆盖要求对有待治理的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唯有如此才不会忽视和遗漏重要的治理议题与对象。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且联动性强,会迅速波及世界,所以人类公共事务的不确定性大大加强,这就要求及时捕捉新的治理议题与对象,补短板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还要确保国家治理各领域、层次和功能的良性互动,以保障体系顺畅运行。国家治理是个系统工程,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治理领域间的匹配、平衡与相互支撑是关键,否则体系就会运转不畅,影响治理的整体性效果。比如,经济治理中片面强调国内生产总值(GDP)挂帅,可能导致不同程度地忽视社会、文化和环境治理,出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失衡。治理的整体性要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协调性。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完善,最终实现治理体系的优化。

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包括思维与认识能力的建设、制度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与全

球治理协调能力建设。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家治理认识的深度。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无疑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目标,但国家治理能力强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管理事务多、拥有的资源丰富和采取的手段强硬。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有必要将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强度区别开来”。^①同时,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要和国家的法治与民主建设合拍。如果只从工具理性的视角强调能力建设,忽视或忘却了国家治理的价值理性,即国家与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服从于宪法,那么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就可能误入歧途。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表明,有关国家治理的认识和思维需要更深刻、更理性。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调能力建设是一个新课题。国家治理并非只是国家内部事务的治理,国家治理是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受到全球治理影响的同时又制约着全球治理。治理是一种整体性治理,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强的新要求、新标准就是以世界情怀与视野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其具体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借助全球治理深化国家治理,比如治理对象上全球治理可内化为国家治理,治理机制上全球治理可规范国家治理,治理理念上全球治理可引领国家治理。二是依托国家治理推进全球治理,比如强化国家治理价值观念体系的现代化可增强对全球治理的认同度与参与热情;强化国家治理决策体系和行政执行体系的现代化可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政治作用与国际影响力;强化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体系的现代化可增强参与和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力度;强化国家治理社会建设体系的现代化可助推社会力量走上国际舞台与参与全球治理。当前,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在一定意义上都与国家缺少统筹协调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能力有关,而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则倡导和强调这种统筹协调能力。

五 结论

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全球化时代两个最基本的政治概念与理论,也是两种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两者在全球化时代中得到进一步凸显。当代全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而这轮全球化的鼎盛时期则是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至今的30年中我们经历并见证了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博弈的三个阶段:头十年体现为全球主义的高歌猛进,中间十年变为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僵持,最后十年则是国家

^① 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主义的强势回归。30年来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碰撞与博弈表明顽固片面地恪守任何一种理念与价值都无助于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正常运行、国际关系的平稳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前行。只有通过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理性定位、协调与融合,才能发挥两者的优势与长处,克服弊端与不足。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正是基于此提出的,它是理论与实践双重需要的产物,可以概括为四个向度的理论内涵,即全球主义的观照与驱动、国家主义的基点与目标、历史主义的尺度与过程、理想主义的关怀与追求。在此基础上可勾勒出该理论的总体特征和内在逻辑。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是一个包含多种理论要素的理论群;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倡导并体现出明显的中庸、综合、改良的理论特征,从而弱化了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理念、价值的对立;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逻辑清晰有力。这个逻辑就是起点—过程—目标,即高扬全球主义的起点,注重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互动、磨合与协调的过程,明确国家主义的目标,从而实现新质的起点、务实的过程和现实关怀的目标三者的统一以及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不仅有理论活力,更有实践价值,它有助于矫正全球化的失误与偏颇,坚守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大方向;有助于促进全球治理原则与体系的反思与重建;有助于破除国家崇拜,遏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狂潮;有助于强化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全球治理面临严峻困境,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或许能够给人类带来新的启示与希望。

概括而言,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力图打破政治的二元思维定式,倡导整体政治观、整体价值观与整体政治哲学。只有摆脱单一、绝对和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的束缚,完成一场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革命,才能在相互对立的理念与价值中找到联系的要素与节点,从而更完整与理性地认知既有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并推出新的具有融合性、整体性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

(截稿:2020年8月 责任编辑:郭 泉)